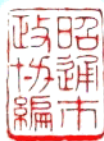


昭通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29



封面说明：

双鱼洗圆形图，系卅年代昭通出土的东汉双鱼洗临摹图。其文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建初八年为公元83年）。此洗系昭通考古家张希鲁先生访获珍藏。现藏昭通行署文化局。横纹系汉砖花纹。

发 刊 词

“昭通文史资料选辑”在中共昭通市委和昭通市政协党组领导下，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第一辑出刊了。

本刊的目的是：搜集、整理有一定价值的昭通历史资料，供地方史研究，并为认识、建设昭通提供研究史料，致用助政。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

鉴于搜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别是抢救历史资料，迫在眉睫。因此，本届政协第一次全会决定出刊《昭通文史资料选辑》。半年来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支持，指导办好本刊，他们虽年事已高，克服了体弱多病的困难，积极撰写自己亲闻、亲历的历史事件。在此致以感谢。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见闻有限，或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或对同一事件所处的角度不尽相同，特别是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因而难免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太准确甚至谬误，特请亲历者和知情人补充、订正，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进工作。

敬希熟悉昭通地方史和藏有昭通地方史资料的同志，积极撰稿和提供资料，惠寄本刊，为建设昭通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发刊词

昭通概说·····	曹吟葵 (1)
彝文“以诺”印章跋语·····	邓子琴述著 (48)
昭通地区回族简史·····	(51)
汉洗记·····	张希鲁 (53)
汉《孟孝琚碑》考释·····	谢允鑑 (56)
关于唐袁滋题名摩崖·····	谢允鑑 (71)
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	张希鲁述著 (81)
云南省昭通中学见闻录·····	伍正之 (84)
概述昭通学生运动之一·····	
——将伪法官绑赴市街游行·····	谢允鑑 (121)
唐、顾混战中的昭通·····	李润民 (124)
“六·一四”政变前后的昭通·····	陈云涛 (129)
东昭人民抗日战争纪略·····	杨 鹏 (132)
昭通妇女的抗日救亡活动·····	陈继英 蒋海明 (146)
滇东健儿在台儿庄之役·····	曹鲁光 (151)
昭通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刘华昭 (154)
抗日战争时期昭通学生的部分活动情况·····	夏运春 (159)
戴仁甫先生传·····	张希鲁述著 (168)
刘陶庵先生传·····	张希鲁述著 (171)

孙厚甫烈士事略·····	邓 连 (175)
张希鲁先生事略·····	贺以明 (180)
抗日战争中的龙云将军·····	黄济舟 (185)
解放前的昭通公路建设·····	邓 连 (191)
解放前昭通人民经受的贫困和灾难·····	刘华昭 (196)
食盐风波——公盐号成立始末·····	焦鸣岗口述 赵昌黎记录 (202) 陈云涛整理
“版纳地毯”史话·····	李洪渊 (205)
三五书店·····	李孝文 (211)
历史上的“朱提银”·····	祝雁南 (214)
征稿启事·····	(2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昭通市第一届委员会姓名录·····	(218)

昭 通 概 说

曹吟葵

昭通地区位于云南省的东北部。地处东经一百零二度五十二分至一百零五度十九分，北纬二十六度三十四分至二十八度四十一分之间。全区面积约二万三千零二十一平方公里。它东北接四川宜宾地区的筠连、高、珙、叙永四县；东南与贵州省毕节地区的毕节、赫章、威宁三县毗连；南与本省曲靖地区的会泽县相邻；西和北以金沙江为界与四川省凉山州的宁南、金阳、雷波县和宜宾地区的屏山县、宜宾县隔江相望。地势南高北低，海拔最低267米，最高4040米。立体气候十分突出，年均气温摄氏15.5度，西北部江边河谷区年均18至21摄氏度；东南部平坝二半山温暖区年均11摄氏度。年雨量的分布也随着地势特点而变化，干湿季节分明，东北部多阴雨，南部多晴天。年均雨量900毫米左右，最高的盐津达1260毫米，最低的永善只有638毫米。全地区有鲁甸、巧家、永善、绥江、水富、盐津、大关、镇雄、彝良、威信十县和昭通市。总人口约三百六十万。在这里居住着汉、回、苗、彝等十三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十分之一左右。昭通市区距省会昆明四百七十五公里，是昭通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一、历代建治史略

昭通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1982年在昭通北闸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离现在五万年左右的“新人”化石。人类由“古人”进化到“新人”。原始社会便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北闸过山洞的人牙化石，是“新人”阶段最早的人类化石，在学术上命名为“昭通人”。由于它是古人与新人的继往开来者，因而对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这说明了昭通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早在五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昭通坝子这块土地上。

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时，在昭通、鲁甸坝子里已经有了居民点。近年来，在鲁甸野石发现了面积达一平方公里的大型村落遗址，可为代表。其他如昭通北闸，鲁甸马厂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些磨制石器（当地人称为雷楔子）和陶器碎片。这些磨制石器有石刀，有肩石斧。陶器为夹砂灰陶。全为手制，厚薄不匀，火候不高。而北闸官寨乡发现的有夹砂红陶，器形可辨的有陶鬲、卷口罐等。这些古遗址和古文物，大多分布在小河附近的台地，它们前临河水，后面靠山。表明了新石器时期昭通的先民们已逐步离开洞穴生活，而居住于河边和坡地。

在四千年以前，中原地区的原始社会逐步解体，我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奴隶社会，历夏、商、西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昭通地区无确切的历史记载，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物。只能从全国的地域区划来看，属古梁州地。《蜀王本记》载：“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这是历史传说中最早的有名姓

的昭通人。杜宇所处的时代，华阳国志所记不确，根据《古代的巴蜀》一书的论证：“杜宇族主要活动在西周至春秋中期。”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为妃，他“教民务农，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说明他重视农牧业的发展。以至蜀国人民农时要“先祀杜主。”

到了春秋末，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但云南大部份地区还处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原始社会。虽然滇西、滇中个别地区有青铜文化的出现，也只是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迹象。这时昭通从属于蜀国。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用司马错的建议，先灭蜀、后取巴。设置了巴、蜀、汉中三郡。昭通属于秦国蜀郡范围。秦国对于云南的开发，首先是从修筑道路入手。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时李冰担任蜀郡太守，即开始由犍道（今四川宜宾地区）顺江开山凿岩、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道路。这一带山岩险峻不可以凿，李冰采取了积薪烧岩的办法。岩石经过火烧，质地变松，容易开凿。这种烧过的痕迹，直到晋代还很明显。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烧过的山崖有红白五色影子映入水中，使江中上游的鱼“至此而止”，不敢再前进。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略通云南，他派遣常頌继续修筑这条道路。常頌把李冰原来从犍道修筑的道路向前延伸。经朱提至建宁（曲靖），全长二千余里，由于道路宽仅五尺，故史称“五尺道”。这条道路尽管狭窄，但它对开发云南，巩固秦的统一都是有利的。略通“五尺道”后，秦派遣官吏对西南夷的一些部落进行直接的统治。四川的商人也把铁农具沿“五尺道”不断输入西南夷地区。昭通早年出土的“蜀郡千万”，“蜀郡成都”的铁锄，就是沿五尺道输入的。四川铁农具的输入，对促进滇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秦亡以后，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统治，曾一度中断。到了汉

武帝刘彻统治时期，经济、文化都极发达。当时的“西南夷”地区，特别是蜀郡西南的犍道地区。（也即是现在的昭通地区）各族人民与四川商人的交往日益频繁，四川出土的盐、铁器、布匹已成为“西南夷”地区各族人民不可缺少的商品。所以在“西南夷”地区复置郡县，已是西汉王朝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派唐蒙为中郎将，通西南夷，设置了犍为郡。唐蒙率领士卒千人，后勤部队万余人，“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北盘江）。《水经注，江水》载：“汉武帝思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犍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曲靖）。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二、三丈”。史书上称这条道路为“南夷道”。在修“南夷道”期间，建置了朱提（今昭通）堂狼（今巧家东川），郁郅（今宣威）汉阳（今威宁）、南广（今盐津）等五县。这就是昭通设县的开始。但是，这条南夷道在修筑中，“数岁道不通……西南夷又数反，……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这就是说：朱提五县只是名誉上的设置，还未巩固起来，仍以犍为遥领五县。昭通在解放前从洒渔河汉墓中发现一枚“南夷长史”铜印，据史验印，“南夷”即是昭通。据李正清同志的论证，西汉置朱提县后，又曾在朱提区域内设置“南夷”县，并给“长史”发了铜印。

汉武帝置郡县后，又“募豪民、田南夷”。即在南夷地区移民屯田。这样，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汉族人民，大量南移，使南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这些汉族移民，就是后来的“南中大姓”的一部份。这说明了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县，移民屯田，对边疆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在朱提县置朱提郡，属县为朱提、堂狼、郁郅、汉阳四县。

当时的滇东北地区，是滇中地区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秦汉

修“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犍道县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沿途都有樊人居住。朱提县就是樊人的主要居住区。《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樊名千顷池。又有龙泉以灌溉种稻。与犍道接……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语言服饰不与华同”。《永昌郡传》成书于东晋前后，其时樊族仍居在朱提郡的坝子里（川中），利用千顷池、龙泉，灌溉种稻，与南徙的汉族人民，一起受当地大姓的统治。同区域内的“夷”族则分布在山谷间，从事山区的畜牧业。“夷”族指的是“昆明诸种”，也即是现在凉山彝族的先民。这个“千顷池”早已不存在了。它就是现在昭通城西南郊肥沃的田野，是现在的昭鲁坝子的一部份。

公元1—5年（西汉平帝元始一至五年），西汉王朝派蜀郡梓潼人文齐到朱提郡任职，他率领当地夷、汉人民“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现在的昭通大龙洞、就是那时开凿的。这位文齐在新莽时期，担任了益州郡太守，又在滇池地区“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他是汉代在云南的水利专家，是云南引进水稻种植技术的第一人。

公元25年后（东汉建武元年），省去朱提郡，称犍为属国，领朱提，汉阳二县，汉代所谓的属国，是“分县治民比郡”，“似郡差小”，即在郡中又立一小郡。其统治对象主要是被征服或强迫迁徙的少数部族。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这时的犍为属国有7938户，37187丁口。它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昭通、鲁甸、巧家、会泽、贵州威宁、赫章的地域。

东汉时期是犍为属国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时期。如前所述，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水稻种植和冶铜技术都较为发达。“朱提银”成了流通全国的特有货币。史载“朱提银”十八两为一两，流值五铢钱一千五百

八十文，其他银一流值千文。朱提县堂狼山，是冶铜中心，这里生产的铜器，行销外地，铸有东汉年号的“朱提”、“堂狼”款识的“双鱼洗”，更著称于世。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繁荣。从解放前后，昭通地区清理的汉墓来看，其葬制及随葬品制作风格，都与中原的基本相同。清光绪27年（1901年）出土的汉孟孝琚残碑，其文词、书法与中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被誉为“滇中瑰宝”。解放后出土的“孟胜”“孟甕”三联铜印，是汉印中的精品，就是在现在的中国，也要高手才能雕刻得出来。晋代成书的《华阳国志》载朱提郡“其民好学，滇健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

东汉末年，经过长期的战乱，中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昭通属于蜀国。公元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刘备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以邓方为太守。这时的朱提郡属县有五，即朱提、堂狼、南秦（贵州赫章）、汉阳（威宁）、南昌（镇雄）。当时蜀国把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称为“南中”。在“南中”设庾降都督，管理“南中”七郡，公元223年，南中一些奴隶主贵族，地方大姓雍闿、孟获、高定元等。乘刘备病死，发动叛乱，一时间战火遍及南中，只有朱提郡和永昌郡，没有参加反蜀行列。这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一方面做好蜀国内部的稳定工作，一方面遣使与吴国修好。着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于公元225年三月开始了南征。南征军分三路出发，诸葛亮率领的一支，从会无县（四川会理）渡泸（金沙江）到朱提郡的堂狼县（巧家）追击孟获。从“五月渡泸”到“秋平四郡”，在云南境内作战约四个月，然后由滇东北班师，经汉阳（威宁）、朱提、石门（今豆沙关）回到成都。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以农治国”，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改善民族关系，采取“抚和”政策。大量起用“夷汉并所服”的当地大姓。他认为“若留外人，终不相信”，多用当地人，可以使

“夷汉初安”。《华阳国志》载：“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孟琰曾率南中万余部曲入蜀，随诸葛亮北伐，官至辅汉将军。爨习官至领军，孟获为蜀国中央的御史中丞。

诸葛亮回师时在朱提留下了一些遗迹。如诸葛营，传为诸葛亮扎营之地，在今昭通城的东乡。诸葛碑，昭通县志说原在昭通双院子，现已不存。据民间传说，碑文为：“头顶凤凰山，脚踏缙泥沟，有人识得破，金银用斗收”。这几句话，是否碑上原文，暂且存疑。不过它告诉人们，只要把凤凰山脚到缙泥沟这一大片土地的水患排除后，这一带地方的谷物，必然能够丰收。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一带正是昭通南郊的米粮川。（注：缙泥沟即今黑泥地。）

公元265年魏国司马炎废除魏元帝（曹奂），改国号为晋，自称晋武帝。泰始六年（271年）把原来属于益州的南中四郡（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划出，设置宁州。但不久，于公元282年又“罢宁州，置南夷校尉，以天水李毅为校尉”。这时昭通属西晋益州朱提郡，领县有朱提、南广、汉阳、南秦、堂狼五县。

公元302年（晋太安元年）建宁太守杜俊和朱提太守雍约贪赃腐败，朱提大姓大中大夫李孟联合建宁大姓毛诜，李睿，反对晋王朝的统治。驱逐了杜俊，撵走了雍约，晋遣李毅讨平后，“复置宁州”，以南夷校尉为宁州刺史。把牂牁、越巂、朱提三郡又划归宁州统辖。

正当南中反晋斗争开展之际，李特、李雄率领的氐叟，青叟流民数万家在四川成都附近举行起义。李雄攻下成都，“除晋法”，采取“薄赋缓刑”的政策，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公元306年（晋惠帝太安二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公元332年（晋成帝咸和七年）。李雄派李寿攻宁州至朱提。太守董炳闭城固守，宁州刺史尹奉派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琛增援董炳，但是朱提是个孤城。（朱提城就是现在昭通旧

府)，粮耗缺乏，守到“八年春正月”，晋将董炳、霍彪、龔琛只好开城投降。朱提为成汉占有。至公元339年宁州又为晋所有，其间成汉政权占领朱提计八年。

公元373年北朝前秦攻蜀，占有益州地后，西南夷各部纷纷归附，宁州为北朝苻秦所统治，朱提辖于北朝。

公元383年苻秦在淝水战败后，宁州复为东晋所有，朱提辖于北朝共十二年。

公元420年，东晋亡，刘裕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是为南朝。刘宋设宁州，领郡十五，县八十一。仍设朱提郡。

公元479年刘宋亡，肖道成称帝，国号齐，史称南齐。公元487年（南齐永明五年）置南朱提郡，治朱提，领汉阳、堂狼、南秦三县，属宁州。

公元502年，肖衍废齐和帝（肖宝融），改国号为梁。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肖方智），创建陈朝。

梁陈两朝，南中属宁州，昭通地区分设为南朱提郡，北朱提郡，南广郡。

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称文帝，年号开皇。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统一北方后，又灭了陈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南北分裂的局面，全国重新统一。隋初，全国地方政权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后改为州、县两级。隋在南中置昆州（昆明）、南宁州（曲靖）、西宁州（今西昌），恭州（昭通地区）。

昭通地区，自西晋建立后，到隋统一全国的三百年间，由于晋王朝改变了诸葛亮的“抚和”政策，对南中各族人民实行全面的军事统治，加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南中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晋书·王逊传》记述王逊为南夷校尉时说：“（王逊）专杖威刑，鞭撻殊俗……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记，获马及牛羊数万余。”这样疯狂的镇压，侵犯

了大姓“夷帅”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激起了夷汉各族人民的反骨斗争。各族人民也在斗争中促进了融合。结成“百世遑耶”和“夷汉部曲”。所谓“遑耶”，当时是汉族大姓与夷族首领间通婚结成的亲家。朱提、建宁二郡是汉族大姓比较集中的地区。《华阳国志》记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建宁郡有“四姓及霍家部曲。”昭通近年出土的晋霍承嗣墓，墓壁绘有夷汉部曲四列，可为史籍的佐证。滇东北经过西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东汉、三国时曾一度经济文化繁荣的昭通地区，逐渐衰落，甚至变为丘墟，居住在这里的汉族屯民纷纷迁至滇中和滇西地区，使唐初云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滇西。

公元618年，李渊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声中夺取了隋朝政权，建立了唐王朝。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朱提改为曲州，领朱提、唐兴二县。据《新唐书》载：“曲州，本恭州，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八年更名，故朱提郡也。”

综上所述，昭通自汉武帝置犍为郡开朱提县，到唐高祖武德八年改朱提为曲州，其间称朱提凡760年。

唐初，除改朱提为曲州外，又在今彝良设协州，今大关设靖州。这些州、县都只是“授其豪帅为牧宰，”而南宁州都督寄治于成都，只是每年来云南作一次巡回视察，没有在云南建立起中央直接统治的地方政权。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公元627年），采取对云南各族接近的政策，改南宁州都督为郎州都督，移治味县（今曲靖）。积极对各部落进行了招抚，并在其地设置了州、县，初步恢复了汉晋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规模。可是，到了唐高宗即位后，没有继续执行唐太宗的民族接近政策，对一些部落实行军事围剿，造成政治上的失利。只有罢郎州都督府，更设戎州都督。把治所由味县又移到南溪（今四川南溪），遥领云南，撤消了中央设在云南的

地方政权，在云南设立十六羁縻州，当时昭通地区有曲州、靖州、协州。所谓“羁縻”照字面解释，“羁”是套马的络头，“縻”是拴牛的绳子。就是说耍像拴牛套马拉住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含义是：内属正统王朝的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实际管理的是少数民族上层，王朝官吏只是遥领，即名誉上臣服于正统王朝。当时在云南实行羁縻之治，实际是社会倒退，从此唐王朝无法统治云南。

自唐天宝以后，云南境内，南诏兴起，公元766年建立南诏国。洱海地区是南诏政治经济的中心。当时昭通地区，属于南诏拓东节度使辖区，但南诏并没有在此地设治，这里是东爨“乌蛮七部落”中的阿竿路（鲁甸）、阿猛（乌蒙）、爨山（大关）三部落。公元794年（唐贞元十年），唐王朝派袁滋为册南诏使，曾途经这里。

南诏的奴隶制社会，延续了二百五十三年。自公元649年（贞观23年）细奴罗即位至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郑买嗣灭蒙舜化贞止，共十三王，其中十个王接受了唐王朝的封号。尽管南诏曾一度叛唐进行割据，并对唐进行了一系列的掳掠战争。但云南各族人民，不愿与内地人民割断历史上的血肉关系，这样就使南诏统治者不得不对唐王朝始终保持着臣属关系。这就显示了云南和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密切的关系，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元年）以段思平为首的广大奴隶、农奴和滇东三十七部落百姓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进军大理，攻破下关，推翻了南诏以后的另一个奴隶制政权——“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封建农奴制政权。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王朝，大理国即自动地向宋王朝表示臣属关系。但是由于宋王朝错误地总结了唐王朝复灭的历史经验。把唐朝灭亡归在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据南诏野史载：宋太祖乾德五年春（967年）

王全斌平蜀还京师，请取云南，负地图进，太祖鉴唐亡祸，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他不要云南。所以大理国得据云南。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玉斧”划不断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的联系，在大理政权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始终对宋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当时昭通地区不属于大理国的范围，隶属于宋叙州羁縻之地，有乌蒙部（昭通鲁甸），乌撒部（威宁县）阿畔部（巧家、会泽），芒部（镇雄）、易娘部（彝良）、易溪部（威信）、阿头部分（贵州赫章）。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乘革囊及筏”渡过金沙江到达今丽江境内，攻取了鹤庆，剑川诸部，进军大理。大理王段兴智逃到滇池地区，忽必烈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镇守云南。公元1254年，兀良合台受元宪宗蒙哥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昭通）。公元1278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置乌蒙路。公元1297年（元成宗大德元年）增设乌撒乌蒙宣慰司，辖乌撒路、乌蒙路，隶属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这是我区从唐天宝以后中断550多年建制后新设治的开始。公元1316年（仁宗延佑三年）调四川军二千人，云南军三千人，在乌蒙屯田，置总管万户府。建乌蒙城于天祗。（《乌蒙纪年》谓建于明嘉靖，不确）。

明王朝平定云南后，首先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完备了土司制度。这种制度是对处于农奴制，奴隶制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但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滇池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有所发展，但农奴经济在绝大部分地区仍占统治地位，特别是乌蒙、东川、芒部等地区，奴隶制残余仍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于边远的山区还保存有原始经济的因素。基于这一政治经济情况，又在元代设置的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的基础上，改“路”为府，更置州县。同时，实行“土、流兼治。”“府、卫参设”的措施以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最终达到废除土司，改设流官，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直接统治的地

方政权。“改土设流”这一措施，从历史发展来看有它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曾有一部份废弃的土司组织叛乱。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芒部改为镇雄府设流官，土司进行反叛，攻陷镇雄府城，夺去流官知府的印。这时与芒部土司有着亲属关系的乌撒、乌蒙、东川等土官“内怀不平，反者数起”。使明王朝无法收拾。公元1530年（嘉靖九年）只有“革镇雄府流官知府，复授芒部土裔脱胜为通判，署镇雄府事。”恢复了土司。

公元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以云南乌蒙、东川、芒部三府隶属于四川布政使司，洪武十七年改乌蒙为军民府，并规定了赋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乌蒙设儒学教授训导各一员，恢复了学校。

清王朝建立初期，仍为乌蒙府，治乐安县，隶属于四川省。公元1726年，清雍正四年以四川省属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省。

清初的“改土归流”是明代“改土设流”政策的继续发展，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进行“改土归流”。但是乌蒙、芒部等地的土司，利用云南四川两省接壤的地理条件，互相勾结，称霸一方。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坚决实行改土归流。他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余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坤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帑，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而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之期。东川虽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据，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这个奏议得到雍正的大力支持，同时